

價值理想的失落與高等教育的德育危機

葉富貴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中國高等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但也產生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高等教育的德育就面臨著極大的危機。本文對中國高等教育德育危機進行了深入考察和分析，認為價值理想的普遍失落是德育危機的根源。而價值理想的失落既體現在國家的教育改革目標中，也表現在高等教育機構的追求中，更展現在個人的行為中。其結果則必然因為沒有共同價值理想的追求，在各種利益衝突中教育改革步履維艱。而要解決道德和德育危機，就應當建立全社會共同的價值理想。

關鍵詞：高等教育；德育；價值理想

20 世紀以來，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是一浪高過一浪，在各種因素的促進下，到 20 世紀 80 年代，教育改革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話語。而所謂教育的國際化、全球化，其實就是在教育改革中不斷實現和完成的。中國前現代化教育在步入現代時，由於拯救不了中國，也就拯救不了自身，在情願或不情願中，進行現代化。現代化就意味著改革，改革中國傳統教育，建立現代教育；改革中國本土教育，引入西方教育。一部中國現代教育史其實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改革動因既然是武力和國力的敗落，改革的方向也就定調在堅船利炮和科學技術。傳統文化和道德雖然仍受到相當的關注和強調，但在改革的基本方向已定的情勢下，只能退居其次了。加上社會轉型、潮流時尚、智育競爭等因素影響，學校德育和道德狀況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高等教育的德育危機

德育，即道德教育，而要論高等教育的德育危機，無疑首先應該考察高等教育的道德狀況。90 年代以來，在中國市場經濟的急速轉型中，在主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教育改革中，中國高等教育的道德水準也在急劇下降，其現實狀況令人堪憂。

從高等教育機構來看，不少高校不是致力於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優秀人材，而是熱衷於搞創收，追逐經濟利益。並且這些高校不是通過正當經濟活動來獲得利潤，而是以變賣文憑的方式來收取錢財。在中國的各類報章上，我們會看到五花八門的進修班、課程班的廣告。有博士、碩士授予權的名牌大學多辦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課程班，一般大學就只好去辦“專升本”之類的學位班、輔導班。自然碩士、博士班的學費比“專升本”之類的要高得多。這導致了不少高校競相申請碩士點、博士點。而申請學位點又不是通過提升教育質量，而是把精力放在對主管部門和相關學術權威的“公關”上。由此又激發了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和人員的道德水準惡化。有些高校還把手伸進自己學生的口袋，巧立名目，向畢業生收費，以至弄得學生、家長怨聲載道，主管政府部門不得不幾次專門發文加以制止。¹至於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經濟腐敗等問題也同樣存在。²高等學校也不再

¹ 《國家教委、教育部關於制止向普通高校畢業生亂收費的通知(1999 年 6 月 28 日)》，《教育部政報》1999 年第 7、8 期。

有溫情和入道，教師在學校的壓力下經受着論文和職稱“非升即走”的煎熬，學生在學校的驅使下成爲學術的、經濟的和榮譽的工具。

從教師來看，在外在和內在的政治、經濟和學術權力與利益的驅動下，將“傳道、授業、解惑”拋在一邊，而搖尾乞憐，諂媚上司；栽贓誣陷，欺凌同事；道貌岸然，虛偽做作；師道不存，學道淪喪。特別是在學術上，作爲以“求道”“弘道”爲使命的大學教師，不少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學術操守。由於中國的現行職稱制度與房子、妻小、權力，金錢、社會聲望乃至政治前途等緊密結合在一起，而職稱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論文的多寡，於是相當多的教師將“科研”放在第一位，置教學於不顧，而所謂“科研”，也就是與職稱相關的發表論文和研究課題。爲了多發文章，一篇論文可以辦作幾篇發，一篇可以換個題目往幾個雜誌投，爲了發文章，論文可以抄襲和偷譯，近年來《中華讀書報》等報刊網站已揭露了張汝倫《歷史與實踐》“抄襲”德文著作等多起論文剽竊抄襲事件。³學界的學術道德確實已經淪喪到令人悲哀慘不忍睹的境地。而教師對學生也缺乏其樂融融的師生之情，不是不關心，就是將學生當作工具。

從學生來看，曠課、遲到在高校學生中已是家常便飯，不少學生不是學校裏用心讀書，而是到社會上去作下三爛的事，好一點的是到公司打工賺錢。平時不學習，一到期中、期末，則抄襲作業、偽造實驗資料、考試作弊，論文抄襲複製更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爲了防止論文抄襲交上去“撞車”，竟在圖書館借閱的圖書上標上“此段已用”等留言，⁴而有些好事者見有利可圖還專門創設網站提供論文複製服務。還有些學生爲了“推研”、留京，挖空心思與老師套近乎，或進行政治投機。最近這幾年“考研”異常火爆，競爭激烈，而競爭的手段也是各呈其能。上了研究生後也不讀書，一年級跳舞談戀愛，二年級打工撰外快，三年級慌慌張張準備作論文，但又要找工作，論文也就拼湊了事。⁵

高等學校中諸如此類道德低下、學風敗壞的現象還很多，不勝枚舉。高等教育機構及主管部門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各種措施，或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加以整改，或就全面的道德危機強化道德教育。如廣東省教育廳就對廣州體育學院亂發文憑的事件進行了調查。⁶對於高等教育機構私開研究生班濫發學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多次發通知要求按法規辦學，指出目前有少數高等教育單位，爲經濟利益所驅動，降低標準亂發學歷文憑和學位證書，甚至用文憑和證書換取“贊助”、“捐資”。這不但敗壞了學風、校風，而且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玷污了高等教育的聲譽。⁷清華大學也已認識到校風對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性，將學風建設作爲2001年到2005年教育教學改革八項重要工作的第一項。⁸至於加強高校德育工作，國務院、教育部、中宣部等已不知制定了多少法規，採取了多少措施。單是1998年以來就普通高校德育工作的有《關於普通高等學校“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加強普通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品德課(公共課)教材建設及管理問題的通知》、《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研究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學生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建設的若干意見》⁹，等等。而且高等教育的道德危機並不是這兩年才有的，

² 《堅決制止“小金庫”有關意見的通知(1999年10月29日)》教財廳[1999]11號，《教育部政報》1999年第12期。

³ 孫周興：《實踐哲學的悲哀》，《中華讀書報》2000年3月29日；孫周興：《悲哀復悲哀》，《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5日。

⁴ 《高校學生畢業論文“抄襲”風氣抬頭》，《江南時報》2000年12月25日。

⁵ 《戀愛、打工、拼湊論文，研究生在研究什麼？》，《中國青年報》2001年1月12日。

⁶ 《廣東省教育廳調查廣州體育學院涉嫌亂發文憑事件》，《南方都市報》2001年1月16日；<http://edu.sina.com.cn> 2001-1-16。

⁷ 《教育部關於重申保證高等教育質量，加強學歷文憑、學位證書管理的通知(2001年2月5日)》(教學[2001]6號)，《教育部政報》2001年第3期。

⁸ 王大中：《為開創21世紀清華大學人才培養和教育工作新局面而努力》，《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⁹ 參見“中宣部 教育部關於印發《關於普通高等‘兩課’課程設置的規定及其實施工作的意見》的通知(1998年6月10日)”教社科[1998]6號，《教育部政報》1998年第7、8期；“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加強普通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思想品德(公共課)教材建設及管理問題的通知(1998年8月11日)”教社政廳[1998]1號，《教育部政報》1998年第9期；“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

前些年就已經存在並被發現且一再加強道德教育，如學位班的問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 1998 年就專門制定了《關於授予具有研究生畢業同等學歷人員碩士、博士學位的規定》（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八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清華大學的學風問題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就“確實令人擔憂”，並為此開展了 6 年多的“學風建設”。¹⁰而 21 世紀又將學風建設作為重中之重來抓，說明問題並未解決。至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近 20 年來也不曾一刻放鬆過高等教育的德育工作。雖然有關部門一再宣稱這些問題都是改革中出現的暫時現象，是可以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的。但迄今，只要是真正面對現實的，還沒有誰抱有信心和希望？既然高等教育的道德教育始終在進行和強化，但高等教育的道德水準卻沒有好轉，甚至一直在走着下降之路，這就只能表明道德教育確實發生了危機。

高等教育德育危機的根源

要徹底解決高等教育的道德危機和道德教育危機，就必須找到危機的根源，然後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病急亂投醫，瞎開處方，恐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有可能引發新的問題。

關於道德和德育危機的根源，無疑是與政治、經濟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所導致的社會轉型相關的。在市場經濟下，一切都趨於工具合理性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政府、組織和個人都競相逐利，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高等教育也與社會一樣變得功利化。政府減少或斷絕了對事業性單位的某些高等教育機構的撥款和支持，取消或減低了教師的福利待遇，高等教育機構為了維護機構運行和其成員的收入水準，就不得不設法“創收”，至於其行為是否符合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道德準則也就顧不及了；高校教師眼見自己收入相對或絕對下降，就去從事各種能帶來收益的活動，至於其是否合乎作為教師的職業道德和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準則也就無從顧及了。

當今世界國家之間、高等學校之間、教師之間的激烈競爭更強化了高等教育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都將教育作為經濟競爭和綜合國力競爭的基礎戰略，20 世紀 80 年代後，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也迅速將政治工具的教育轉變為國家和經濟競爭的手段。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指出：“世界範圍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競爭，實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和民族素質的競爭。在這個意義上，誰掌握了 21 世紀的教育，誰就能在 21 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於戰略主動地位。”¹¹政府通過行政措施、評價標準、撥款方式等改革推進高等教育改革，高等學校相應在院系設置、學科、課程、評價標準等方面作出改革，而高校教師同樣調整自己的學術方向、研究模式、教育行為等。而其表現遠遠超出上文所羅列的種種現象。

高等教育的工具合理性並不只存在於中國大陸，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及其所導致的道德和德育危機在世界上同樣嚴重。歐美日本無一不將教育作為國家發展和經濟競爭的手段。“1950 年以後，人們越來越根據教育對於國家的需要和國家的政策所作的貢獻來評價學校教育……一定的教育活動對於政治和軍事作出的直接的或潛在的貢獻，決定了這個教育活動是否值得進行，同時也提供判斷這個教育活動是否有效的標準。”¹²在美國許多教育家都認為，“國家如果想在經濟和軍事的前沿與蘇聯展開有力的競爭，學校就應該在像道德教育這樣的‘軟’領域中少花時間，而在學術性主題上多花些時間，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國家產品的多少和核彈頭的數量而

(2000 年 4 月 6 日)“教社政[2000]3 號，《教育部政報》2000 年第 7、8 期。

¹⁰ 周兆英等：《把建設優良學風落實到班級》，《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0 年第 2 期，陳剛等：《學風建設的回顧與思考》，《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¹¹ 國家教育委員會辦公廳：《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文獻選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

¹² 羅伯特·梅遜者，陸有論譯：《西方當代教育理論》，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7-8。

不是個人的道德自律。”¹³然而結果確是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和高等教育、大學生普遍的道德衰退，人們甚至稱之為另一次“羅馬帝國的衰亡”¹⁴。於是，道德教育重新興起，“對品德教育重新感興趣源自 60 年代的騷亂、城市和大學校園的動盪、日益增長的犯罪，以及成年人對一些新的青年文化(包括廣泛吸毒和性自由)暴力特性的反對，是促使道德教育復興的原因。”¹⁵道德教育的研究也隨之復興。但西方國家政府對待高等教育的工具性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並沒有消解，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問題依然存在。

很明顯，工具合理性所導致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是全球性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本身也有全球化的因素，但這並不能說明和解釋中國德育和道德教育危機的特有表現。中國與世界其它地方的高等教育德育危機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整個高等教育價值理想的失落。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效益與公平之間一味追求效益，大力發展科技教育，忽略人文教育；積極支持高等教育，迴避基礎教育；重視技術和應用研究，輕視基礎研究；關注高等教育的經濟成果，淡漠高等教育的文化意義。高等學校不是追求普遍價值和真理，而熱衷於轟動效應，不斷擴大大學校規模，追求學生數、論文等數量指標，而不問教育和科研質量，大量開設諸如 MBA 等帶來較高收益的學科和專業，而忽視作為人類價值和知識基礎的學科和專業。大學教師寫起文章來還擺出一副知識份子“人類良知”的模樣，但做起事來卻成為權力和利益的附庸。從 80 年代開始，大學校園中相繼興起了薩特熱、尼采熱、弗羅伊德熱，到 90 年代又興起傳統文化熱、國學熱，而沒有哪一次真的熱下去了，彷彿一陣風一片雲，吹來又飄去。而現在的大學生連對價值問題的思考都不做了，跟着感覺走，自然就沉入自我中心和物質主義中。

價值理想的失落

中國高等教育德育危機的根源既在於價值理想的失落，那麼，這種價值理想的失落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首先，80 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導致了從前的價值理想的破滅，但新的價值理想卻沒有樹立起來。從 50 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把共產主義的政治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灌輸給了人民，並通過學雷鋒等方式將之貫徹到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但 80 年代後，對“文化大革命”的揭露和批判一下子使全國人們的信仰發生動盪，大學生更因為其知識和理想產生理想幻滅。1980 年 5 月《中國青年》刊發的 23 歲青年潘曉題為《人生的路阿，怎麼越走越窄……》的信是極具代表性的。現實的市場經濟改革又使高等教育機構和大學生的經濟地位和社會聲望下降，一下子就使他們變得無所適從。80 年代的大學生還試圖尋求價值理想，到 90 年代後期，“價值理想”在大學生那裡已成為了引人發笑的概念和話題。

80 年代的價值理想失落與共產黨和政府在一些問題上的處置不當有關，這導致了共產黨和政府在大學生心中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道德和政治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社會主義本來不僅是一種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吸引千千萬萬中國人為之奮鬥和犧牲的，更在於其道德理想，社會主義所秉有的公正、平等、正義、仁愛、溫情……，遠比其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打動人。但今天，中國的道德合法性卻在國內和國際上受到挑戰。雖然人們的經濟狀況在改善，但短暫地體驗了改革的收益後，很多普通民眾再次懷念起 20 多年前無憂無慮的社會主義道德和福利。萬俊人曾這樣分析 90 年代初“紅太陽”革命歌曲的流行：“無論人們怎樣評價毛澤東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時代，借革命經驗和領袖權威培植起來的革命道德曾經有效地主導過中國社會的道德生活秩序這一歷史事實卻給予新中國民眾以難忘的記憶。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期那種夜不閉戶、人心激昂的景象於眼

¹³ Hersh, Richard H., *Models of Moral Education: An Appraisal*. London: Longman, 1980, P14.

¹⁴ 菲力浦·孔希斯著，趙宣恆等譯：《世界教育危機》，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78。

¹⁵ Hersh, Richard H., *Models of Moral Education: An Appraisal*. London: Longman. 1980. P23.

前金錢紛飛、物慾膨脹的情景形成了太大的反差。”¹⁶另外，在國際上，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權一直受到譴責，雖然美國的動機是人人皆知的，但對中國政府的道德形象無疑構成了打擊。本來，社會主義的理想已將人權的內容都包括在內，但黨和政府卻很少將之作爲自己的宣傳或號召。爲什麼不將自己的道德形象樹立起來呢？沒有黨和政府的價值理想的引導，又如何指望一個急速轉型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機構和民眾決定其價值和理想？而高等學校和大學知識分子雖然本來應作爲社會的良知和道德模範，但工具性的高等教育已使大學和知識份子沉淪了，擔負不了社會批評和價值理想的角色了。

中國的社會轉型並不從80年代始，19世紀中期開始的現代化已引發了中國的文化 and 道德危機。“新與舊、東方與西方的現時衝突隱含着一種令人擔憂的道德危機；因社會轉型過於急速而帶來的道德傳統——不僅是中國古典道德文化傳統，而且還有近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革命道德信念或傳統——自身綿延危機。”¹⁷而中國古典道德文化傳統延綿的危機有西方衝擊的因素，也有中國自身的因素。中國本是非常有歷史感，重視文化道德傳統的民族，但近代以來卻不知爲何卻陷入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迷狂。在新文化運動和全盤西化派的眼中，中國是一部不道德的歷史，充滿着虛偽、陰謀、不平等、人吃人……，完全是邪惡的歷史。這就將2千年的中國文化道德全給否定了。即使是以中國文化道德爲職志的新儒家也缺少對歷史文化的敬意和尊敬，先是否定馬列主義，再否定新文化運動，接著又上溯到西學東漸時代清初，認爲三百年中國學術文化和知識分子不斷走著下降之路。這樣層層否定，直到宋明理學才是歸宿。¹⁸這種趨勢在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道德和教育研究中一直延續下來。建國初期的教育史是批判封建社會和國民黨時期的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十七年”的教育，改革開放後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如此冤冤相及，何時是終了。

在這種不斷批判和否定中，道德和價值理想的崇高性也就沒有了，結果是誰都可以來嘲弄道德，出現了一種“蹂躪道德的現象”；故意將道德規範加以違反、嘲笑和奚落，將違犯道德的言語和舉動故意做得張揚，對符合道德的現象故意加以嘲弄和羞辱。¹⁹在一個沒有道德準則的社會，道德教育如何可能呢？

問題還在於，中國的道德教育並不是純粹的道德教育，而是“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²⁰。當把不斷受到批判、嘲笑、唾棄和否定的中國歷史文化道德來教養學生時，會在學生的價值理想和道德信念的鑄造中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呢？學生能因此樹立人生的道德信心嗎？當本民族的文化道德不能成爲其價值理想的基礎時，又能完全指望用西方的道德價值來替代嗎？

教育本身的內在特性也使價值理想的歷史傳承帶來困難，“教育者和文化權威的闡釋者，一方面因爲維護文化傳統，必須堅持培養學生對既有文化的認同感，一方面，爲了研究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須鼓勵學生對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考、重新闡釋和觀念創新。”²¹在當代，教師與學生的代溝也是教師與學生價值理想和當代落差的一個原因。

¹⁶ 萬俊人：《比較與透析——中西倫理學的現代視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417—418。

¹⁷ 萬俊人：《比較與透析——中西倫理學的現代視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412。

¹⁸ 參見拙作：《現代新儒學家的思想特質》，《清華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

¹⁹ 《道德重建與制度安排》，《中國青年報》1996年10月29日；楊明：《當前高校道德教育面臨的挑戰與創新》，《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

²⁰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德育大綱》。

²¹ 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紀的教育哲學與教育經濟學》，《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結論

正因為沒有共同的價值理想作基礎，所以在高等教育中，政府、高等教育機構、大學教師和學生缺乏共同的道德判斷、道德認知和道德交往的基礎，德育也不可能取得效果。在中國高等學校中因為價值基礎的不同所導致的德育衝突是屢見不鮮的。如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與思想品德課教的是“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並以此批判“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個人中心主義”，和闡述集體主義的人生價值觀。但管理學課教的是管理哲學的人性論基礎就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中灌輸的是社會主義信念，而經濟學課倡導的是“不搞私有化，就建不成市場經濟”。²²更何況不少教師連所講的自己都不信，憑什麼感召學生呢？國家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教育行政部門、高等學校和教師提供的道德內容本身就是衝突和矛盾的，憑什麼要求學生樹立堅定的價值觀、人生觀和政治立場。在價值和道德衝突中，各部門和個人為了“小我”利益，都堂而皇之地以自我的“價值”、“道德”來行事，而且還以改革的名義將自我利益的機制制度化和合法化。大學中有的院長、主任常在制定某一規則、制度時使之僅合乎自己的標準和條件，然後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獲得種種利益。愈是這樣發展下去，高等教育的道德問題將愈多，中國的文化和社會整合將愈多亂象，道德教育危機將愈深重。所以，要解決道德和道德教育危機，首先應在高等教育和全社會建立共同的價值理想。

然後，應把共同的價值理想作為政府政策基礎、高等學校的目標、教師基本準則，並化為統一課程教給學生。美國從來的改革雖多是科技取向的，但也從來沒有忘記要形成美國高等教育和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如1948年美國總統委員會《美國民主社會中的高等教育》所確立的目標就有：“培養學生具有與民主理想相一致的個人和公民生活倫理原則標準。”²³1984年美國高質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組在《投身教育：發揮美國高等教育的潛力》就批評過分職業化的課程會“失去它培養共同價值觀念的潛力，正是這些價值觀念和知識把我們結成一個社會整體。”²⁴中國社會和高等教育要重視較高的道德水準，無疑也要通過教育熔鑄一種共同的道德和精神價值觀念。

²² 吳倬：《建立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高校德育系統》，《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

²³ Gary E M, *The Mean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8.P123.

²⁴ 美國高質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組：《投身教育：發揮美國高等教育的潛力》，教育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編：《發達國家教育改革的動向和趨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8。